

# 一幅海外客家文化长卷

读邓晓宇《基于语料库的海外客家研究》有感

□文瑞



邓晓宇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针线，将藏在各国档案馆、图书馆里的书信、族谱、报刊等碎片化史料一一缀连，终成一幅脉络清晰的海外客家文化长卷。

我以为，这部书的精妙之处，在于以“量化数据+定性解读”的研究闭环，让海外客家的前世今生跃然纸上。邓晓宇教授及其团队整合文献计量法、计算机辅助文本分析法，借助 KH Coder、Python 等工具，从海量语料中精准提取族群、经济、教育、民间信仰四大核心议题，又以 LDA 话题分析模型打捞起每个议题下的代表性词汇。这种研究方法，与我们以往依赖田野调查、定性描述的路径截然不同，它让研究的每一步都有数据为证，每一个结论都经得起推敲，彻底打破了传统客家研究“一叶障目难见泰山”的局限。

翻开书页，四大篇章层层递进：论族群，突破“民系”框架，聚焦客家女性“家庭支柱+经济参与者”的双重角色；谈经济，勾勒海外客家人在“一带一路”沿线的奋斗轨迹，印证“稳中求进”的文化基因延续；说教育，直指海内外研究短板，为海外华人教育提供“全面传承、创新模式、全球视野”的方向；话信仰，跳出东南亚研究的单一视角，探讨客家信仰在拉美、非洲等小众区域的落地与融合。

更令人称道的是，邓晓宇教授作为优秀学者所具备的全球性格局与国家层面的大思考。她并未将研究局限于学术本身，而是站在“连接客家中国与客家世界”的高度，让这部著作成为一座沟通本土与海外客家的桥梁。在她的笔下，海外客家不仅是迁徙的族群，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全球的鲜活样本；语料库技术不仅是研究工具，更是解码侨脉深处文化基因的钥匙。这种格局与情怀，让客家研究跳出了狭隘的地域视角，真正融入了国家文化战略的宏大叙事——通过分析核心文化词汇的高频使用，印证海外客家人刻在基因里的文化认同；通过梳理传统节日与宗族仪式的传承，彰显中华文化“和而不同”的包容性。这些研究成果，不仅丰富了中华民族共同体“多元一体”的理论内涵，更为“一带一路”沿线的文明互鉴提供了务实借鉴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贡献了学术力量。

对于深耕闽粤赣的客家研究者而言，这部著作更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路径。它让我们明白，客家文化的脉络从未因山海阻隔而断裂，反而在跨文化的互动中愈发坚韧；当下客家研究也不必仅局限于本土族群，完全可以借助语料库技术，与全球客家社群展开对话。可以说，邓晓宇教授的探索，为客家学研究开辟了跨学科的新范式，也为我们这些本土研究者打开了更广阔的学术视野。

掩卷沉思，我想起多年前在龙岩围屋听老人讲述祖辈下南洋的故事——那时只当是寻常乡愁，如今读罢此书，方才懂得，客家人飘洋过海时怀揣的故土、世代坚守的乡音，正是他们文化根脉的象征。

从20世纪90年代末起，我开始涉猎客家文化。二十余载的田野调查与文化书写，我的视野与行脚大多徘徊在闽粤赣边地区的山乡村落。我踏过的青石板路、走访过的耄耋老人、抄录过的祠堂碑铭，最终都化作笔下的文字，凝结成《客家故园》《赣南书院研究》等关于本土客家文化的著作。我与诸多同好一道，致力于挖掘闽粤赣客家地区的深厚底蕴，梳理客家民系在这片土地上的发展脉络，笔墨所及，皆是本土社会鲜活的客家印记。

然而，在漫长的岁月里，总有一块空白横亘心头——那些漂洋过海、散落五洲的客家人，他们在异国他乡如何扎根生存？如何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中坚守中华文化根脉？他们的族群认同、经济形态与民间信仰，又经历了怎样的嬗变？这些问题，我们只能从零星的口述史或碎片化的侨批中窥探一二，始终难以拼凑出完整的海外客家文化图景。直到捧读邓晓宇教授所著《基于语料库的海外客家研究》，我才豁然开朗。这部著作不仅填补了本土客家研究者的认知空缺，更以语料库技术为钥，打开了海外客家研究的新大门，其独到的学术价值与格局情怀，值得每一位客家研究同好细细品读。

客家文化本就是一部迁徙的史诗，从中原腹地到闽粤赣边，再到远渡重洋散落全球，客家人的每一处足迹都藏着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文化密码。此前，黄建淳、杨彦辉等学者虽为海外客家研究倾注心力，但大多止步于史料梳理或区域个案分析，鲜少将其置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宏观视野下深耕，更遑论对散落全球的客家文献进行系统整合与量化分析。邓晓宇教授的这部著作，正是看准了这一学术痛点，以语料库技术为

# 为自己保留一点回忆

——关于《平常人事》

□李伟明

《平常人事》是我出版的第二本书。2007年3月出版第一本小书《我想我说》之后，意犹未尽，出书的冲动还在继续着，真是“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”，于是很快便谋划着第二本书。到了当年12月，《平常人事》就在同一家出版社——大众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了。

与杂文集《我想我说》不同，《平常人事》是一本写人记事的散文集。全书共收录52篇文章，分为“亲朋印记”“岁月留痕”“江湖纪事”“生活幻影”“学士列传”五辑。其中，前四辑写于1997年至2007年（也就是参加工作以来至该书出版那一年），“学士列传”则写于1993年至1995年（当时正读大学）。

这本书在容量上，比《我想我说》还要小，大32开，总共154个页码。文章篇幅都不长，每篇一两千字而已，加在一起还是显得大单薄了。而且，和第一本书一样，缺乏前言后记之类的说明文字。正因为如此，觉得有必要为它补一篇文字，尽管它早就被人遗忘了，或者说从来就没有被人记起过。

从书名就可以看出，这些所谓的“散文”，记录的都是些普通的人与事，写作手法也是传统的。我平时读散文不多，也没有琢磨过写作技巧之类，毕竟咱干的不是“文学”的事，文字能力离“文学”也相距太远，但这并不妨碍把自己的经历见闻记录下来。“亲朋印记”“岁月留痕”“江湖纪事”这三个部分共32篇文章，可以说是写实的，不算是人还是事。“生活幻影”“学士列传”则带上了一定的虚构色彩，本来是想把它们写成小小说的，但觉得情节还达不到，于是当作散文处理了。当然，也是因为要出这本集子，同类作品数量不够，所以将这种文体有点模糊的文章拉进了这个“阵营”。关于散文是否可以虚构的问题，曾经有过争论。我认为，散文当然是可以存在虚构成分的，如果完全纪实，那就可能归到新闻或文史系列去了。事实上，很多散文，无论

是情节还是情绪，怎么可能完全真实？写作时，已是时过境迁，不可能百分百还原当时的情形。还有，散文家族又分为若干品类，有些原本就属于虚构的（比如寓言）。因此，对这个问题，也许不必过于拘泥。

出这本书时，本来不想考虑学生时代的稿件（觉得幼稚了），但为什么还是把写于大学时代的“学士列传”收录进去呢？说起来，我对这一批文章（共12篇）还是比较喜欢的，实在不忍心让它们遗失。这些文章源于身边的生活，写得还算鲜活，在当时，一度引起不少同学和老师的共鸣，甚至还有黑龙江《新青年》、广西《三月三》等刊物的编辑在寄刊时专门附信鼓励我。学校中文系写作教研室主任方春老师以前不认识我，在我毕业时，看了这批文章之后，说人物形象很鲜明，这篇让他想起教过的某学生，那篇又像是某一届的另一个学生，等等。为此，他很想让我留校当写作课教师，并郑重向有关领导推荐。但因为“你懂”的原因，他失望了。饶是如此，他仍不甘心，还积极将我推荐给市里一所中等师范学校。方老师这份热心，让我一直深深感动。我本人倒是不敢误人子弟，所以并不很在意（那时学校的待遇也确实不够吸引人，曾有师兄在留校后还是忍受不了清贫南下广东了）。

读大学时，写的东西逾百篇，“学士列传”这个系列给我带来的稿费最可观。当时，最多的一篇达到120元（发在《粤港信息日报》），而那时一个月的伙食费不过四五十元。也就是说，这批稿件，随便哪一篇的稿费，都足够解决我一个月以上的生活费。虽说“文章不为稻粱谋”，但对于一个正宗的穷学生来说（我那时的部分学费还是借的，毕业后自己还），这样的稿费，还是颇让人高兴的。只是，其时并未觉得那些报刊有多么可贵，甚至还是道是寻常。直到过了许多年之后，发现物价涨了多少倍，而很多报刊的稿费并没有发生什么实质性变化，这才知道，原来，还是早些年的

文章更值钱。“事后诸葛”的事总是不可避免，现在回首，其实这个系列完全可以再写一些篇章，可是那时也许肚里没货，也许不够勤奋，竟然才写区12篇就没有再继续写下去了。

年轻时间不够，思考力不足，所以写东西思路打不开，基本上是简单的就事说事，不仅写得少，而且写得浅。把这批文章收集起来，也只是为了方便自己保存而已，纯属自娱自乐。文字是心路的见证，只要是出于自己的笔端，它就是真诚的，不会骗人。对我业余写作者而言，写作的意义可能也在于此，努力为自己保留一点回忆。就像更多的人喜欢以摄影摄像的方式记录自己的过去，你能说它们没有意义吗？只要自己觉得有意义，大概就值得去做吧。

当然，写得少，虽然和阅历简单有关，但根源还是动力不足，惰性太重。我常常感叹，出书方知写得少。平时听一些业余写点小文章的朋友自我感觉写了很多，我便问他们说，你先辑录一本集子试试，就知道到底写了多少。自然，他们把稿件一整理，就发现根本不够出一本小书，或者不够出一本同体裁的小书。我们一年写那么几十篇小文章，真是少得可怜。有人说，写作不以数量论英雄。但另一方面是，在数量有限的情况下，怎么可能保证出书的质量呢？——起码要有个选择的余地吧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时不时出一本书，还真可以倒逼自己多动动手。所以，近些年，我力争每年出一本书，以这种方式迫使自己不致过于偷懒。

《平常人事》出版以后，写人记事的文章写得极少。并非无事可记，而是觉得时候不到，而且这种事情没有时效性，让它们沉淀沉淀以后再写也无妨。生活中的很多事，对经历者而言其实还是挺有价值的。我想，也许，到时候，还得集中写一批这样的文章，为自己多保存一些有意思的回忆。

# 研究红军标语漫画的「活档案」

——评卜谷《满街红——记忆红军标语》

林绍棠

卜谷著《满街红——记忆红军标语》于2025年10月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。这是一部以红军标语漫画为独特切入点，展现红军长征精神与革命信仰的长篇纪实文学作品。作者历时二十余年，行走赣南原中央苏区腹地，广泛搜集、实地考察并深入采访，终于将散落民间、濒临消逝的红军标语漫画系统整理并付梓成书。

《满街红——记忆红军标语》的出版，在学术界和作家群体中引发广泛关注。此书最令人震撼的，并非宏大的叙述，而是那些字迹斑驳、笔画稚拙却力透墙壁的红军标语，尤其是夹杂其中的漫画图像，看似质朴天真，却蕴含着惊人的精神力量。它们或刻于悬崖峭壁，或书于土墙木梁，出自普通红军战士之手，却在极端艰苦的革命环境中，迸发出坚定的信念与无畏的英雄气概。正是这种直抵人心的精神力量，令人掩卷难忘，甚至生出“相见恨晚”之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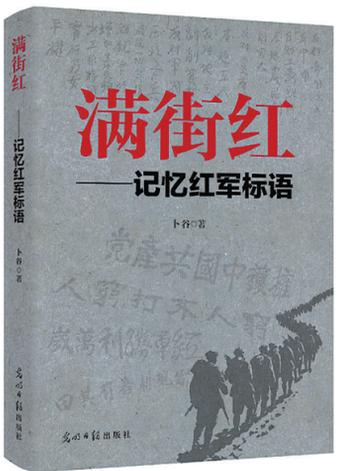
此前，市面上亦不乏有关红军标语的图书。作为一名长期关注红色文化研究的读者，我也曾系统阅读相关著作，虽有“见识一新”之快感，却总觉得意犹未尽：史料零散呈现，背景阐释不够深入，部分内容缺乏可靠物证与系统论证，留下若干历史疑团。正是这些长期萦绕心头的“遗憾”，使我在反复阅读《满街红——记忆红军标语》之后，愈发感受到它的难得与可贵。

相比同类作品，《满街红——记忆红军标语》是以红军标语漫画为核心视角，系统书写红色精神谱系的不可多得纪实文学作品，不仅题材新颖，研究深度也整体跃升。那些曾经悬而未决的历史迷思，在书中逐一获得回应，其间的学术严谨与文学表达，令人拍案称绝。

该书最突出的成功之处，在于作者沿着“红痕—初心—传承”的内在脉络，层层展开叙述：既写标语漫画的历史生成与现实处境，也揭示其所承载的革命理想与精神力量，并将之与当下时代相互观照，进而还原出一幅立体、生动的历史画卷。

尤为动人的是，作品并未将“标语”与“漫画”停留在符号或史料层面，而是将其转化为有温度、有情感的历史叙事。书中通过大量实地走访和口述史材料，重现了每一条标语背后的斗争现场与人性光辉。例如第一章“天地之间有大大碑”，宁都蜡烛寨崖刻的“红十五军”四字，并非简单书写，而是以刀锋刻下的血誓；又如第三章“小村文墨”，红三军团留下的“拥护中国共产党”，在当地流传着“一条标语是一支军队，满屋标语就是千军万马”的说法，生动折射出当年军民一心、热血沸腾的革命氛围。

从整体结构看，不同时期的标语漫画，清晰呈现出红军在不同历史阶段的革命理想、斗争任务与战略指向：既彼此衔接，又各有侧重。这种复杂而有序呈现，对作者的史识与整体驾驭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。卜谷凭借深厚的红色文化研究功底，沿历史脉络作出系统



卜谷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

梳理，使全书结构严谨而富有张力。

具体而言，该书至少在三方面体现出鲜明价值：

其一，史料搜集系统而可信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大量红军标语漫画因房屋倒塌、自然风化而消失，幸存者多散落于偏远山村。作者二十余年如一日，深入赣南原中央苏区各村寨，既实地采集实物，又追访当事人及其后代，并结合地方博物馆藏品进行比对印证，确保史料来源真实、链条完整。相较部分同类著作的零散呈现与证据不足，《满街红》的学术可靠性尤为突出。

其二，分类清晰，时代特征鲜明。作者按革命进程对标语漫画加以梳理：红军初创时期，“打倒帝国主义”“实行耕者有其田”，是觉醒的呐喊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，“打土豪，分田地”“一切权力归苏维埃”，是有力的动员；抗日战争时期，“停止内战，一致对外”，凝聚起民族抗战的共同意志；解放战争时期，“解放全中国”“将革命进行到底”，指向成立新中国的伟大目标。这种分期呈现，使读者得以清晰把握红军标语随时代演进而呈现的不同内涵。

其三，图文并茂，史料价值弥足珍贵。“图”在本书中并非装饰，而是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正是这些真实留存的标语与漫画，使抽象的革命精神变得可触、可感。它们既是艺术，也是文物，更是历史的见证。随着边远山区土坯房的逐渐消失，这类标语漫画面临彻底湮灭的风险。卜谷的抢救性整理，不仅是文学创作，更是一项意义深远的文化保护工程，可谓功在当代、利在千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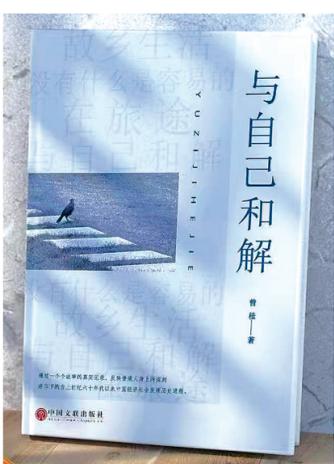
总体而言，《满街红——记忆红军标语》让红军标语漫画的历史意义、文化价值与精神内涵得到集中呈现，使革命年代的信仰之光穿越时空，与当代读者形成深度共鸣，既具可读性，又具史料价值，堪称研究红军标语漫画的“活档案”。

# 给自己以更多柔软

□刘日东

宁都作者曾桂个人散文集《与自己和解》日前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，该书收录作者多年来创作散文100篇，分为《故乡生活》《没有什么容易的》《在旅途》《与自己和解》四个篇章。细读收录进本书的作品，给人的最大感受有三：内容真实、叙事平实、批评据实。

先说内容。在本书中，作者试图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，反映深刻烙印在普通人身上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历史进程。从20世纪60年代作者出生，一直到当下岁月，时间跨度大。所涉内容既有少时家庭变故、求学生涯，大学毕业初涉社会、创办事业等情景回顾，也有经营家庭、社交往来、旅痕心迹等生活记录。字里行间，不回避事实本身，不掩饰个人实时的本真感受。



曾桂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

这样的写作是有意义的。一者，它解决了我们普通写作者常觉得没什么可写的问题。每个人的生活都是由一个个片段构成的，把这一个一个片段记录下来，就是一个个独有的写作题材，就是一个一个可资咀嚼的故事。二者，真实的就是历史的。个人小命运，社会大命运，真实的个体经历，其实就是历史的缩影。让普通人的故事反映出历史背景，我们的写作才有社会属性，才有个人追求与价值体现，这也成为我们愿意写作的最大内在动力。

这本书里，凡人物活动、细节刻画、情感表达等，均无过多修饰和渲染，平实叙事随处可见。比如在开篇《父母婚姻》一文里，作者写到小时的自己，“尚在襁褓之中，父母就离了婚”，生母离开了他，但因为同在一个地方生活，难免跟她不期而遇，“她有时会拿一些小点心递到我的跟前来，那东西对我是很有诱惑力的，我虽然很想接过来，可我终究不敢，父亲严厉的警告在我耳边响起。我把手反放在后背，往后退几步，否则她会塞到我手里来，那样我是难以拒绝的。停留片刻，随即逃离她，远远地停下来，抹去嘴角流下的口水。”在这里，记述是冷静的，感情是压制的，但予人的冲击力却是震撼的——这便是平实的力量。

本书还有不少篇目涉及社会批评，这类作品不大好写，但作者显然作了艺术处理，即让事实本身说话，交由读者自己去体味。

我们为什么要写作，各人有各人的答案。作者自己也承认，由于自小生活环境的影响，他的性格很长一段时间“比较容易急躁易怒，对人不够宽容”，再加上事业路上经历太多，他太需要找到一个“出口”让自己柔软下来，于是写作就成了他的不二选择。“为情而造文”，在书中我们读到的是作者内心的需要，是对亲情的和解、对社会的和解、对生活的和解。